

# 王士禛诗学研究 | WANG SHI ZHEN SHIXUE YANJIU

孙纪文〇著



本书对于王士禛诗学文献、诗学体系、诗学思想的研究，  
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WANG SHI ZHEN  
SHIXUE YANJIU

# 王士禛诗学研究

孙纪文〇著

◎ 可比性诗学问题论析 ◎ 诗歌选本与王士禛诗学思想的关联 ◎ 王士禛诗学思想构成刍议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士禛诗学研究/孙纪文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7-03672-2

I. 王… II. 孙… III. 王士禛(1634~1711)—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529 号

**王士禛诗学研究**

**孙纪文 著**

选题策划 刘永霞

责任编辑 贺秀红 王佐红

封面设计 赵倩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http://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mailto: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13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672-2/I·108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 赵達夫

从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揭起“复古”的大旗之后，直至清代前期叶燮（1627—1703）、王士禛（1634—1711）等人出现，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方面流派迭起，正如长江波涛，前后相推相连，显示出中国诗学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景象。前七子之“复古说”本是针对明代台阁体末流冗弱平庸的流弊而发，但至其末流，又走上缺情感的模拟的路子。明清之际，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虽把“忧时抚志”作为“主旨”，然而仍强调先辨形体之“雅俗”（《宣城蔡大美古诗序》，见《安雅堂稿》卷二），并追求体格之单纯，讲究学一种就专学一种，不能杂入其他体，实际上是对模拟作出了硬性规定，不许走样，自然也就不能革新与创造。当此之时，诗歌理论的新变，只等有力者振臂一呼。陈子龙已言国家政治的盛衰，决定着诗歌的风尚，说：“夫鸟非鸣春，而春之声以和；虫非吟秋，而秋之响以悲。时为之，物不能自主也。……念乱，则其言切而多思；望治，故其辞深而不迫。”（《三子诗选序》，见《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明末极衰之时，崇祯继位，陈子龙尚以为国家有望，即倡导温柔和平盛世之音。至叶燮、王士禛之时，清朝统治者和整个社会都已经不可能接受思明排满、刺乱愤俗之作。叶燮有《原诗》一书，其《内篇》上下两卷阐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对诗歌的发展规律、创作原则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突出地显示出严密的理论性。

与系统性。《外篇》的两卷，进一步申明《内篇》的主张。全书宗旨，主张抒写性情，提倡革新创造，批判了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与主张，提出要从诗歌发展的实际出发，弄清“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从理论上对过去的诗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学者们对叶燮的成就评价高，这是对的。但就叶、王二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影响而言，难作轩轾之论。

王士禛没有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但有《渔洋诗话》及与人论诗之作数种，在其笔记、序跋中也存有大量的论诗文字，后人编为诗话多种，影响极大。他论诗主“神韵”，然而其诗学思想非仅“神韵说”可包含。今人多因对“神韵说”的看法有分歧，评价时有偏颇。我以为评价一个作家、学者，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中，联系作者所处环境、所面对的问题而加以观察。同时，论其主要观点、重要主张，也应看其整体，不能简单化。就王士禛诗学理论的整体结构而言，不能简化到只剩下“神韵说”。

首先，王士禛生活于康熙盛世，当时满清统治完全达于稳定，社会经济也空前发展，天下一片升平气象，如前所述，从社会现实决定文学的题材、思想、主题、风格方面说，明末清初一些诗人、学者所倡导“怨刺说”等，无论从上（统治者）、从下（一般读者）、从同道（一般文人作家）来说，已难以接受。尤其从统治者的一方来说，有极其严厉的惩罚制度，以防止文人对大清王朝的非议。当时的文网是很严密的。清朝初期，忌讳很多，文人动辄以诗文获罪。王士禛为诗坛盟主达五十年之久，他在此政治环境之中不可能不考虑当时诗歌发展应取之路径。这个路径得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不易违反忌讳、形成互相牵连的文祸；二是从诗的表现方式、艺术趣味来说，有

利于保持含蓄和有意境、有诗情、耐回味的特质，因为这是诗这种文体的基本特色。所以，他在前人有关论著的基础上，拈出“神韵”来，加以阐发张扬。

我们并不避讳，“神韵”这个词语的运用，并非起自王士禛。南齐谢赫论画首标“气韵生动”。其《古画品录》评顾骏之画云：“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细致，右过往哲。”以“神韵气力”与“精微细致”对举，则其“神韵”指凭借笔墨、又似在笔墨之外给观者的艺术感觉，包括表现事物精神风貌、引起观者艺术想象的种种因素。唐张彦远《论画六法》云：“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神韵”指由形状体态所表现出的真实生动的精神风韵。清初一些画家（如王时敏、王鉴、王元祁、王晕）在其画论中也标举神韵。而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已用“神韵”评盛唐诗歌。其《内编》卷二云：“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此其占便宜处。”卷四言宋人学杜“亦皆得之百炼，而神韵遂无毫厘”。卷五言《早期》和王、岑、杜诸作与初唐七言律“气象神韵，迥自不同”。又言岑参同李颀、王维比，“神韵不及二君”。卷五云：“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又云：“故古人之作，往往神韵超然，绝去斧凿。”明末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也时用“神韵”以论诗，如云：“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又云：“五言古非神韵绵绵，定当捉襟露肘”。清初毛先舒《诗辨坻》卷三论初唐四杰之诗，认为“自不乏神韵”。侯方域《陈其年诗序》也说：“夫诗之为道，格调欲雄放，意思欲含蓄，神韵欲闲远，骨采欲苍坚，波澜欲顿挫，境界欲如深山大泽，章法欲清空一气。”翁方纲等似以“神韵”之说非自王士禛始，而贬其功。其实王士禛所标举“神韵说”内涵同此前一些画论

家、诗论家所说“神韵”有些不同。王士禛是作为一个中心主张来加以阐发、充实和张扬的，他企图定出一个在相当长一个阶段中应遵循的诗歌主张。应该说，这既是他审时度势的结果，也是对诗的特质了解透彻，对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尤其对明代以来各家各派之说进行了深刻思考的结果。

其次，王士禛于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由扬州司理累官至刑部尚书，直至谢世，政治地位较高。这同叶燮的登进士第五年后才任宝应县知县，次年即因触忤长官而被参落的情形不同。叶燮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一种个人精神，相当程度上其著述无关他人，在当时不一定有很多人关注，但王士禛则不能不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叶燮在《原诗》中对儒家正统的所谓“温柔敦厚”也加以批评，表现出明显的民主精神，但王士禛以其地位和影响就不可能这样做。同时，王士禛面临当时诗坛很多具体问题，包括写序跋，回答一些人的问题，同一些学者讨论等。他是在他领导诗坛的具体实践中体现出了对诗歌发展的一系列看法。

再次，王士禛的诗学主张并不限于“神韵”。在诗学主张上故意与王士禛作对的赵执信曾引述吴乔“诗中须有人”（吴乔《雨炉诗话》卷一）之说，和苏轼“诗外尚有事在”（苏轼《东坡题跋·评子美诗》）之说，来驳王士禛。其实，王士禛的诗论并非排斥美刺之言论，而且对雄深、豪健、沈著、痛快的艺术风格也加以肯定，而不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他说：“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跋陈说岩太宰丁丑诗卷》，见《蚕尾续文》卷二十）可见他认为雄浑、豪健与“神韵”并不矛盾，而应与“风调”及前人所说“神韵”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王士禛的“神韵说”是在理论上有所拓展发挥的诗学理论，差不多包含着有深远的意境

等诗人艺术特质方面的基本要求，只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突出了含蓄、清远的风格导向。

所以，对于王士禛在诗学理论上的贡献，以及当时历史条件下在诗歌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应予认真研究。新时期以来，王士禛的一些诗论著作先后被重新出版，有的并加整理、点校、笺释，研究性的著作也出版了好几册，如伊丕聪的《王渔洋先生年谱》，蒋寅的《王渔洋事迹征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裴世俊的《王世禛传论》，黄河的《王士禛与清初诗学思想》，王小舒的《王渔洋与神韵诗》《神韵诗学》，相关的著作有吴调公的《神韵论》，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等。而海峡对岸学者的书则出版得更早：如黄景进的《王渔洋诗论研究》。面对这样多的功底深厚扎实、研究全面深入的论著，应该说很多问题都已经探讨得差不多了，对王士禛的评价，也逐渐地趋向了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一些较为偏颇的看法。但是，作为主持清朝鼎盛时期之诗坛五十年之久且留下大量诗学论著的诗论家，并不是存在的所有诗学问题都已解决了，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了。有些问题，大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2004 年孙纪文同志在福建师大获得博士学位，2006 春进入西北师大博士后流动站，从我论学。纪文同志在宁夏大学中文系任教，专业是古代文学批评史，在福建师大，师从郭丹先生，硕士论文为《淮南子文艺思想论》，博士论文为在此基础上的拓展《淮南子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淮南子》是《吕氏春秋》之后又一部综合、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巨著，包含着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丰富的思想资源（山东银雀出土汉简唐勒《论义御》证明《淮南子》中有些文字是将先秦之书稍加改窜编入其中，其所据不少书今日已失

传)。对此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传统文论形成与发展的状况，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对研究汉代以后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很有益处。我同他讨论后根据他的兴趣，确定以“王士禛诗学文献研究”为课题，进行研究。我以为，对王士禛这样一位论著很多、著作之版本也比较复杂的大学者，有些问题的解决，只从理论上还说不清楚，应从基础上做起。因为从文献上说，既存在是此、是彼的问题，也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甚至存在是有、是无的问题。无论怎样，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审视，总会有新的收获，得到新的启发、启示。

因纪文同志在单位还带着研究生，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所以在流动站延长了半年时间。但为了完成这个课题，他到王士禛的家乡山东桓台县(清代新城)等地进行学术考察，拜访了不少当地熟悉地方文献、掌故的人，在山东、北京等地查阅了大量资料。2008年春他完成了出站报告，我们讨论过几次，他又进行几次修改。在2008年底出站报告鉴定会上，专家们对此报告给予好评。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此书的几点看法。

首先，研究的视野比较开阔，全书在梳理王士禛诗学研究史的基础上展开，对王士禛诗学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探究。下面依次从新的角度解读王士禛的诗学理论，分析可比性诗学问题，王士禛的诗歌选本与其诗学思想之间的关联，阐释王士禛诗学思想的构成要旨并作出当代评判。全文旨在表明：王士禛诗学是对明代诗学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清初诗学的一种新的建构。王士禛诗学与唐诗学、宋诗学的精髓息息相关，王士禛诗学是传统诗学中的理论典型形态，我们应秉持历史的、逻辑的态度去理解古代诗学理论，并深切体悟其中的文学意味。这些

学理判断是颇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

其次，研究的内容不乏新意。一是关于王士禛诗学文献的考辩研究。书中刊出《渔洋诗话》的十多种重要版本，考定冠名为王士禛选编的《陈后山·戴石屏诗》是伪作。二是关于王士禛诗学理论学说的研究，认为“神韵”的审美实践意义是确证了审美距离的必要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审美批评范畴，使审美者获得艺术超越的空灵感；“神韵说”之外，王士禛诗学理论学说还有“声调说”、“辨体说”和“本色说”。三是关于可比性诗学论题的研究。作者认为，王士禛在继承严羽诗学思想的同时，在诗歌取法方面、文艺辩证关系的阐释方面对严羽诗学进行了超越。王士禛尊崇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他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建设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不懈努力。王士禛既推崇杜诗学，又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批评，他是清初著名的杜诗学家。四是关于王士禛的诗歌选本与其诗学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作者认为，在“辨体论”的基础上，《古诗选》确立了唐代古诗的正宗地位，王士禛力图以兼容的态度取法历代古诗，他崇尚五言古诗的风骨之美和古澹之美，崇尚七言古诗的气格高妙之美和沉郁顿挫之美。《二家诗选》表明王士禛对于充满神韵色彩的徐祯卿、高叔嗣的诗歌格外推崇。王士禛关注的是唐诗的真面目真精神。他寄寓唐诗选本之中的诗学思想是开放的和融通的。五是关于王士禛诗学的当代评判研究。作者认为，王士禛诗学既有兼容的性质，又表现出有所突破的新气象。这些观点无疑为清代的文学选本研究、诗歌批评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再次，研究方法上有些探索。全书着眼于全面研究王士禛诗学的面目。研究的前提是诗学文献研究，并且将文献学本体

研究、理论阐发和现代观照三者相结合，共同构建文献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的叙述语境。既重视诗学文献的甄别辨析，又重视诗学思想的挖掘分析，还重视以现代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对王士禛诗学作出自己的阐释。因此，思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总的说来，我以为孙纪文同志的这本书在王士禛诗学研究、在清代诗学研究的方面是有创获，有价值的，它的出版必将引起研究中国诗歌史、清代诗学的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是为序。

2008年12月

赵逵夫，男，汉族，1942年生，甘肃西和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赵逵夫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专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与古典文献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先秦文学与文化、诗赋研究上造诣深厚、影响巨大；其楚辞学研究更是成就卓著、自成一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70余篇；出版《屈原与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屈骚探幽》《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主编兼主要作者）等专著。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 绪 论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王士禛出身仕宦，并有诗名。他不仅是清代康熙年间名重一代的文坛领袖，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因此，研究王士禛诗学对于清代诗学文献研究而言，对于清代诗学思想研究而言，对于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

以往的研究表明，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王士禛所标榜的“神韵”说及其理论价值方面。实际上，单纯地以“神韵”说的理论来概括他的诗学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王士禛的诗学史观、诗歌文体论、诗歌声调论以及诗歌美学思想，都是他的诗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本课题的研究正是着眼于全面研究王士禛诗学的面目而进行的。而研究的前提是诗学文献研究。本着这一构想，便确立了本课题的大致思路范围：围绕王士禛所存世的诗学文献为研究视阈；围绕王士禛诗学的内容构成要素为研究视阈。研究目的主要在于：解析王士禛诗学文献的文献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对于诗学文献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一些深入的考辨；阐发王士禛诗学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并且以王士禛诗学研究为个案，为清代诗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一条探索的路径。

选题的意义主要在于：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某些诗学问题寻源探究，各有所考，为王士禛诗学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有力的根据。

较全面地考察王士禛诗学文献的主旨内容，了解王士禛诗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演变轨迹，并对他诗学理论进行价值评判。从文艺学的角度深入研究王士禛诗学思想形成变化的文化缘由，力求做到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清代的文学研究、诗歌批评史研究拓展一些空间。

研究王士禛诗学，应把文献学研究、理论阐发与研究者的现代观照结合起来。

文献学研究，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王士禛的诗学文献进行研读和探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对既有诗学文献的整理；对被忽视文献的开发；对诗学文献的辨证。我们的研究应一切从文献学的学科要求出发，在史料清理的基础上，尽力去还原王士禛诗学文献的历史面目。在此前提下从事诗学文献的理论阐发就有了夯实的基础。

理论阐发，意味着对王士禛诗学的文艺学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理论评判。古代诗学文献的研究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理论的层面，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现在许多研究著作往往借鉴现代或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来分析、评价古典诗论的价值，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研究绝不能生硬地借西方文论的框子来搭建论文的骨架，而是有赖于对王士禛的诗学文献进行索引发微，反复涵咏，然后选择可比的理论话题与清代诗学进行比较研究，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从而将王士禛诗学文献的理论价值揭示出来。

诗学文献学的研究是学科性质的表现，理论阐发是诗学文献的理论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但是，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现代观照意识的缺失。实际上，从事诗学文献的研究，从事诗学研究，同样需要研究者自身具有评析诗学文献现代学术意义

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课题的研究还要从自己阅读诗学文献的历史意义出发，从品味诗学理论的文学批评史意义出发，来审视王士禛诗学的当代意义。这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学术要求。

因此，《王士禛诗学研究》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是：将文献学本体研究——理论阐发——现代观照三者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为基础，以理论阐发为提升，以现代观照为学术增长点，共同构建本课题的叙述语境。在这三者的整合中，我们着力探寻王士禛诗学的文学批评史价值。

基于选题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考虑，本课题的研究拟从两个视角切入，一个是文献学的视角，一个是文艺学的视角。前者着力于探究王士禛诗学文献的文献学意义，后者着力于探究王士禛诗学文献的文艺学价值。而这两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立论基石，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深入，两个视角互相交叉共同定格在诗学文献的学术价值上。

第一个视角下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1. 王士禛诗学的研究回顾。研究的目的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王士禛诗学研究的历程，廓清研究思路，同时，也为今日的研究提供一些前瞻性的话题。

2. 诗学文献叙录。王士禛的诗学文献，不仅有《渔洋诗话》《五代诗话》和《带经堂诗话》等诗话著作，同时在他所著的笔记，诸如《池北偶谈》《分甘余话》和《古夫于亭杂录》等文献之中，在他所写的序跋，诸如《唐贤三昧集序》《赵怡斋诗序》等文献之中，也包涵大量的诗学思想。因此，研究内容一方面是将诗话著作作详细的叙录，另一方面也要将笔记、序跋之中有关

承载王士禛诗学思想的诗学话语抽离出来作综合的考察，然后写出综合性质的叙录。

3. 诗学版本系统研究。目前学界关于王士禛诗学文献的版本研究成果很少。例如，《渔洋诗话》有一卷本、二卷本和三卷本之分，仅三卷本就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黄叔琳刊本、雍正三年（1725年）俞兆晟刊本、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竹西书屋重刊本、《四库全书》本、《清诗话》本、民国十年（1921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等多种版本，而且扫叶山房石印本是二卷本。这些版本的系统如何？卷数如何？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诸如此类的研究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4. 诗学文献的新发现。新发现必须建立在通读大量文献和考索大量文献真伪的基础之上而进行，不可作欺人之语。通过有关文献的研究，署名为王士禛的《陈后山·戴石屏诗》这个诗歌选本很可能是假托之作。当然这个“新发现”还需要得到学界的认同。

第二个视角下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1. “神韵”说的美学蕴涵。王士禛“神韵”说的渊源远可追溯到六朝画论之“形神”说，近与明代胡应麟《诗薮》中所倡导的“兴象”说有紧密的关系。同时，“神韵”说与禅宗有关联，与道家学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它们成了“神韵”说共同的精神源头。“神韵”说的内涵是由“神”与“韵”构成的，它与诗人的心灵观照息息相关，也与鉴赏者的心灵感悟息息相关。因而，“神韵”不仅指诗歌作品的精神、骨力和风格，也指诗歌鉴赏中读者所体悟到的诗歌内在的流动美和韵律美。

2. 诗学文献中被忽视的理论新质。“神韵”说为王士禛诗学的精核。但是，“神韵”说并非是王士禛诗学理论的全部内容。

以往我们的研究常常聚焦在“神韵”说上，视野显然过于狭窄了。本课题以为，王士禛诗学文献中被忽视的诗学理论至少还有：一、古诗声调说；二、本色说；三、辨体说。这些理论学说与“神韵”说既有联系，又有独立的诗学理论内涵。它们与“神韵”一起构成王士禛诗学思想的主体内容。

3. 诗学思想的可比性研究。诸如王士禛与严羽诗学之间的关系研究，王士禛与清初唐诗学之间的关系研究，王士禛与清初杜诗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诗学思想可比性研究的三个视点。以此表明，王士禛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宏阔的开放性。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王士禛诗学内容中的新质。

4. 诗学思想的构成刍议。王士禛的诗学思想是由一个系统构成的。具体而言，从宏观的诗学背景看，清初诗学思想的趋势是由唐诗学向宋诗学过渡，并且呈现出相融的态势。而王士禛诗学思想比较复杂。他早年宗唐，中年宗宋，晚年又复归于唐，因此，他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可变轨迹可寻。从微观的诗学理论主张看，王士禛的诗学思想一方面倡导“神韵”理论，与司空图、严羽一派相呼应，另一方面他又欣赏诗歌的“沉着痛快”之美，与王、孟一派山水田园诗歌的旨趣有所背离。因此，王士禛的诗学思想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其构成要素是：唐宋兼善而偏于盛唐，推崇自然清丽与雄浑厚重兼美的诗学思想而看重清远飘逸。王士禛诗学思想之所以是一个矛盾体，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审美情趣和诗歌创作原本具有兼容的性质。

综上可以看出，研究王士禛诗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史价值。立足清代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王士禛诗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批评论价值。主要表现在品评鉴赏诗歌既

要有理论支撑，又要有包容性。二是文体论价值。王士禛的诗学文献多样，它的文体也多样，有诗话、有诗评、有笔记，真可谓各体兼备。研究这些文体的特性，对于当代文学批评来说也不无裨益。三是诗学辩证价值。王士禛的诗学文献涉及面广，探讨的问题深邃。针对古代诗歌史的演变和发展，针对古代诗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王士禛都作出一定的评判和研究，这些内容值得我们加以再评判和再接受。

围绕这些研究内容，本课题力求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1）版本系统方面；（2）前人的研究偏颇方面；（3）诗学文献的新发现方面；（4）诗学思想的构成方面；（5）理论争议方面。当然，我们的研究也存在难以回避的难点。如：版本的系统研究还停留在感知层面，还缺乏某些重要的文献支撑。再如：如何评判王士禛诗学思想的创新性等等。

简言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课题的研究力争做到既有所开拓，又有所创新，研究眼界更上一层楼。

当然，学术研究的视野是受一定历史语境限制的。刘若愚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认为，研究比较文论时，“我们必须致力于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寻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点和性质以及批评的概念和标准”<sup>①</sup>。此言对于中国古今文论的比较研究也有参考价值。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潜在的可比对象自然是中国当代文论。虽然王士禛的文学思想与当今的文学思想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深刻解释其中无法沟通的思想矛盾。这种困惑将促使我继续探究未知的诗学问题。

---

<sup>①</sup>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9 页。